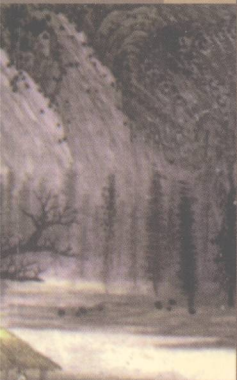


唐宋八大家传 ⑤

王安石传

吴小林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唐宋八大家传 (5)

王安石传

吴小林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安石传/吴小林著.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12
(唐宋八大家传; 5)

ISBN 7-5361-2609-3

I. 王… II. 吴… III. 王安石-传记 IV. K827.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8801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广州大道北广州体院內 20 栋)

广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1 插页 220 千字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18.00 元



王安石像

《唐宋八大家传》总序

唐宋八大家者，唐宋文坛之八颗巨星也。稍有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人都晓得他们就是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及曾巩。“八大家”之称，虽然晚至明代才提出，但他们在活着的当时，已拥有浩浩荡荡的追随者，对后世的影响更是无法准确估量，关于八大家的研究文章和著作真可谓卷帙如山了。

如今继续啃死人骨头还有味道么？至少我们认为，答案是不宜简单否定的。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我们曾目睹过不少伤筋折骨者，据给予治愈的杏林高手透露，那主治的丹方中就用了枯骨所研成的细末。啃死人骨头的目的，理应是为了活人。世易时移，活人的病变花样是层出不穷的，枯骨何以更有效地治疗今疾？这就存在着继续研磨的需要。

文章最忌随人后，著述从来贵创新。赶时髦并不意味着创新。不知始于何时，“运动”一词时髦起来。在那不断地运动群众的年代，“运动”更是时髦得很，以致我们的一些学者也趋附了，把八大家及其追随者在不同时代的分散努力也冠之以“唐宋古文运动”的名堂，髦得可爱。然而名实是否相符？本丛书有的著者就提出了新的见解。

往昔的论者，多用“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来概括八大家的文学主张，认定他们的宗旨是“复古”、“兴儒”。事实果真如

此吗？当然，八大家说过不少“志乎古道”、“文必与道俱”之类的话，但这“道”的实质，仅是古儒之道，乃至腐儒之道吗？不。“复古”、“兴儒”恐怕只是他们打出的旗帜，真正的目的乃是要摧毁那华而不实、束缚自由的骈俪文风，推动文学朝“言必近真”、“文从字顺”的方向革新。不然的话，他们的另一些更具影响力的至理名言将作何解释？“词必己出”，“古人亦人耳”，只宜“师其意，不师其辞”，“惟陈言之务去”云云。显然，他们是坚决反对拘泥古训、食古不化的。

“四人帮”曾经鼓吹过臭名昭著的“帮八股”，其流毒虽被改革开放的大潮所荡涤，然而有些人，也许余悸在心，也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迄今真正意义上的文艺批评并未蔚成风气，动辄有“打棍子”、“扣帽子”之类的帽子飞来；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的形而上学思维惯势，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界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准确评价。本丛书试图克服这种种偏向，尊重历史事实，扬善而不溢美，抑恶而不失真，还八大家的本来面目。所谓“八大家”，是个文学概念，因此，本丛书着重勾勒传主的文学家形象，即使是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王安石也是如此。在此基础上，开拓新思路，从新时代的视角去观照八大家所走过的道路，挖掘他们最可宝贵的改革创新精神，探究他们成功的奥秘，为酿就新时代的新文风贡献绵力。这就是组编本丛书的终极目的。

“不泥古”、“不落套”既然是八大家的作风，本丛书也就不打算从体例、格调、篇幅等方面去强求死板的一致，以免形成新的俗套，束缚诸位著者学术专长的自由发挥。八大家中苏氏父子占了三家，为行文方便、避免重复起见，只好委屈“三苏”合为一卷，并非缘于粗制滥造或因陋就简。这是要向读者诸君特意说明的。另外，八大家中有三家出自江西，因此我们特约请江西籍

或长期在江西工作的学者、专家撰稿。他们出于对古代乡贤的仰慕，长年潜心研究，广泛搜集资料，充分利用地方文化的优势，相信他们是不会令读者失望的。

时代呼唤着新的文坛巨星，愿这小丛书伴随着众多的新星焕发光彩。

杨明新 何业光

1996年中秋于广州天河

前 言

北宋是文化极度繁荣、全面高涨的朝代，涌现出了很多中国文化史上的多面手和杰出人物，王安石就是其中的一个。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丰山，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世称临川先生。因曾封荆国公，人称王荆公，谥号“文”，又称王文公。

王安石所处的北宋中期，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交困，而统治者又因循苟且，不思振作，这是一个弊端丛生、孕育变革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王安石经过自身的努力，不仅以一个文化艺术的多面手，而且以一个杰出的改革家而彪炳史册。

在政治上，他倡导熙宁变法，是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年青时就以稷、契自命，有着远大的志向。以后在长期任地方官的过程中，对各种社会积弊有了更深切的了解，于是“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宋史·王安石传》）仁宗时，他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系统的变法主张，但未被采纳。神宗接位后，锐意改变现状，王安石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揭示当时在“无事”背后所隐伏着的深刻危机，又在不少场合与神宗议论治国变法之道，深得神宗赏识。不久，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第二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全面推行新法。当时士大夫们为了清除社会弊病，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争言便宜，以变更旧制，提出了各种各样改革政治的主张。而王安石所实行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以

理财整军、加强法治为主要内容的变法，相对而言，是对症下药，较为彻底的。事实上，实施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使国家财政状况好转，危弱局面改观上起了积极作用，某些新法还被后世保持下来。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反对派的阻挠以及其自身的缺陷、流弊，熙宁变法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所表现出的对改革事业的远见卓识，执着态度和顽强意志，至今仍能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列宁称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他是当之无愧的。

在哲学上，他创立荆公新学，是富有革新精神的思想家。王安石主要学习儒家著作，而对诸子百家之书，尤其是法家、佛学和老庄思想都有所吸纳，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儒家经籍作出新的解释，一时号为“新学”。他认为宇宙万物是由物质性的元气所构成的，具体地说，是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元素的变化，推动了宇宙万物的变化。他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反对天命论，认为天与社会人事了不相关，不能决定人的吉凶祸福；驳斥袭故蹈常的论调，倡言变革旧制；强调不顾流俗之见，坚持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他指出万物是相对而存在，同时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揭示了事物对立统一的规律。他还提出“新古相除”的论点，指明事物新陈代谢的过程，提倡除旧布新。这些都具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倾向，为其实行变法提供了哲学基础。王安石的“新学”与“蜀学”、“理学”鼎足而立，成为宋代影响最大的思想体系之一。

在文学上，他参加北宋诗文革新，是诗文兼擅，对词亦有所创辟的文学家。

文方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以欧阳修为首的北宋散文革新集团的重要骨干，为自然流畅、散句单行的古文重放光

彩作出了独特贡献。在散文主张上，他具有突出散文经世致用，强调散文功利目的的倾向，但又不排斥散文的艺术性和审美作用。在散文创作实践上，他表现出政治家兼古文家的鲜明特色：立意新颖，观点超卓；长于议论，擅于说理；结构严谨，逻辑周密；语言简劲，文辞奇峭；内容丰富深刻，紧密为变法服务；风格既区别于韩愈的雄奇奔放，柳宗元的沉郁峻峭，又不同于欧阳修的委婉自然，曾巩的雍容平和，苏洵的简切老辣，苏轼的旷放恣肆，苏辙的疏荡纤折，显得刚劲峭拔，雄健奇崛。他的散文在“唐宋八大家”中独具一格，在北宋乃至整个中国散文史上是别树一帜的。

诗方面，他是北宋杰出的诗人，为宋诗的发展起了独特的作用。王安石发展了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的诗歌革新成果，前期多为古诗，题材丰富多样，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风格平易质直，雄健劲拔，后期多为律绝，主要是写景抒情，咏物言志，诗风精工深婉，寓悲壮于闲淡之中，开创了“荆公体”。在确立工理尚意，“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严羽《沧浪诗话》），重视表现形式的精细工巧等宋诗独有特点上，欧阳修开风气之先，而王安石则“始一大变”（胡应麟《诗薮》卷五），为苏轼、黄庭坚最后形成宋诗特色奠定了基础。他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词方面，虽作品不多，但引言志、怀古等题材入词，风格雄放疏朗，“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对后来苏轼开创豪放派词起了积极作用。

王安石在各方面也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变法中他有时固执己见，操之过急，在用人上有失误，处理与同僚的关系有不当之处。思想上也有命定论、英雄史观、神秘主义等唯心主义因素。散文创作过分强调实用功利目的，对文学特性和审美作用有所忽

略。某些诗歌，特别是一些紧密为变法服务的篇章，写得质木无文，缺少诗意。其词劲直有余，婉丽不足。但这些并没有影响到他作为一个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改革家和文学家的主流。

王安石在政治、思想、文学各方面的卓越建树，加上他轻视功名富贵，不慕酒色财利，勤政爱民，廉洁刚直的高风亮节，“平生行止，无一点涖”（《元城语录》），称他为“一世之伟人”（黄庭坚《跋王荆公祥简》），绝非溢美。

本书是《唐宋八大家传》之一，当然着重从王安石作为一个文学家，特别是散文家的角度为他立传，可是王安石主要是个政治改革家，况且他的诗文创作又是与其变法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必须照顾其全人，尤其要给其政治生涯和变法过程以足够的篇幅，在这方面如何安排材料，谋篇布局，颇费心思。加之王安石一直是个褒贬不一，评价分歧的历史人物，在这方面比之“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又著述丰富，史料浩瀚，涉及面很广。所以本书无论在观点上，还是在材料取舍、结构安排上，难免有不当之处，还望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正。

目 录

前 言	(1)
一 王氏家世	(1)
二 求学应试	(10)
三 地方从政	(26)
四 入京为官	(53)
五 任相变法	(83)
六 闲居江宁	(139)
七 诗词成就	(180)
八 散文主张	(213)
九 散文风貌	(237)
后记	(284)

一 王氏家世

(一)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其先世出太原，后迁徙至抚州临川，遂为抚州临川人。

“王氏由工部之叔父尚书主客郎中赠太常少卿诤观之始起家为能吏”（曾巩《永安县君谢氏墓志铭》），临川王氏中人科举及第，跻身仕途，是从安石的叔祖王贯之（一作观之）开始的。王贯之于咸平三年（1000）中进士，历任汉州军事推官、大理寺丞、大名府大名县知县、忻州通判等职。后作真定府（今河北定县）通判时，其上司府帅王嗣宗盛气凌人，经常欺侮折辱下属，时间一长没有人敢任该府的通判，他到任后，王嗣宗照样加以欺侮，他不与之计较，仍以礼相待。十多天后，他去巡视监狱，发现由于王嗣宗久不断案，狱中关押了数百名犯人。他即刻一一审理，除判定数十人有罪关押外，其余认为无罪当释，在得到王嗣宗同意后，便释放了全部无罪者。此举大获百姓与上司的好评，而王贯之却说这是王嗣宗的主意。从此，王嗣宗对贯之言听计从，一府遂治，人们以此称贯之为长者。其时还有个过去曾欺凌过贯之的人做他的下属，他不计前嫌，举荐其升迁为京官，别人批评他以德报怨，他也不以为意。

后来，贯之调任提点淮南刑狱，兼劝农事。他在刑狱方面，

务在宽民，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农业生产上。他组织农民兴修水利，使五万九十顷土地受益，从而得到皇帝真宗的褒奖。其间还发生了一件影响其仕途进退的事。在赴淮南任职前，宰相丁谓曾托他关照当地的两个人，说都是能干的官吏。而他到任后发现他们都有罪，于是不留情面地予以揭发惩办。由此得罪丁谓，后来丁谓借故将他贬为监池州顺安镇酒税。仁宗接位后，移滁州，又移知兴元府。及丁谓获罪移南方，人们认为贯之定会重新受到朝廷重用，他已身患重病而不起。终年六十二岁，官至尚书主客郎中。

王安石从他的亲属那里听到有关叔祖王贯之的事迹，写了《主客郎中叔祖墓志铭》，由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叔祖王贯之关爱百姓，正直无私的思想品格非常推崇。

(二)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初字损之，后改字舜良。祥符八年（1015）登进士第，任建安县（今福建建瓯）主簿，当时年纪较轻，县人看不起他，数月后，其所作所为，却令县人畏服。起先县人不按时交税，州上归罪到县里。他查清问题出在负责收税的小吏身上，于是将他们抓起来，每人杖二十，限三天内将税款收齐。此举果然见效。从此，那些不法之徒，都不敢正视他。另一方面，他对贫民则十分同情，收赋税时宽以待之。因此，他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

后改任临江军（今江西清江）通判。当上司、同僚有不法行为或处置不当之事时，他总要引用旧例，据理相争，豪绅大姓之家，肆意违法，为非作歹，他也毫不留情，严加惩处，临江军为之肃然。豪绅大吏对其恨之入骨，他们贿赂负责监察州县官吏的

转运使，将他调任新淦（今江西新干）县令。

在新淦县令任上，他也很有作为，不久就使县里大治，受到百姓的称颂。后改大理寺丞，知庐陵县（今江西吉安），又大治。改殿中丞，知新繁县（今属四川）。到县后，了解到一伙人宿奸犯法，他除严惩为首的几个人外，其余的从轻处理，以恩信治之，从此治安面貌大改，县衙竟可以长时间不动用刑罚。

后又知韶州（今广东韶关），改太常博士、尚书屯田员外郎。在韶州期间，他打破岭南的陋习，一发现有男女关系问题上的违法现象，就要查个水落石出，并加以严治。此事曾被胡瑗采入《政范》一书，可见其传颂之广。韶州的属县翁源多虎，经常为害百姓，他下令捕捉。后来打死了五只老虎，县令为了巴结他，叫人割下虎头，抬着送到知州衙门，还当场念了颂文。王益对此颇为反感，把来人赶出州衙，并退还颂文，叫他们回去转告县令：“政在德不在异。”此事得到百姓的赞扬。他还建造兵营、仓库，修筑驿站、道路，把地方建设得井井有条。当地长老都说自岭海臣服朝廷以来，还没有一个太守像王益这样贤明。

明道二年（1033），父亲逝世，王益守完三年孝后，通判江宁（今江苏南京）府，改都官员外郎。由于他办事能干，勤于公务，成为上司的得力助手。宝元元年（1038）病死于官任上，享年四十六岁。

王益为人倜傥有大志，“尝欲大润泽于天下，一物枯槁，以为身羞”（《答韶州张殿丞书》）。在外勇于为事，刚直倔强；回到家里，则和蔼温驯，对父母非常孝敬，对兄弟十分友爱，对族人也关怀备至。他生活很节俭，几乎达到吝啬的程度，但看到别人有困难，就马上慷慨相助。他对待子女从不打骂，常以孝悌仁义之理，古今存亡治乱之道教育他们。

他还博学能文，曾作诗百余篇，“虽此不足尽识其志，然讽

咏情性，其亦有以助于道者”（《先大夫集序》）。后王安石将这些诗编为《先大夫集》，并写了序言。此集今已失传，然清人厉鹗辑撰的《宋诗纪事》卷八中收录了王益的一首与梅尧臣之叔梅挚的唱和诗《和梅公仪留题重光寺罗汉院赠宪上人》：

晓剃吟髭雪半零，海窗曾咒钵龙醒。早同西竺能持法，应笑南僧不会经。云气昼闲侵麈柄，藓痕春老上铜瓶。近来禅观都无语，手指余花满寺庭。

此诗描写寺院清幽静谧的景色和僧人的悠闲恬淡，意境幽僻，文笔清雅，约略可见王益诗歌的风貌。

王益远大的抱负，爱护人民、抑制豪强的作为以及刚毅果敢的性格，对王安石有很大的影响。

王益先娶徐氏，再娶吴氏，安石为吴氏所生。安石生母吴氏抚州金谿（今江西金溪）人，父尚书都官员外员郎吴敏之弟敏，母黄氏。她“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曾巩《仁寿县太君吴氏墓志铭》）。对待公婆非常孝顺，对待子女十分慈爱，尤其疼爱非己所生的长子、次子，“故其子孙已壮大，有不知为异母者”（同上）。她乐善好施，急人所难。教子又极为严格，不以其仕途升黜进退为意。享年六十六岁，封长寿县君。

叔父师锡，“少孤，则致孝于其母，忧悲愉乐不主于己，以其母而已。学于他州，凡被服、饮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归，虽甚劳窘，终不废”。“其外行，则自乡党、邻里及其尝所与游之人，莫不得其欢心。”（《叔父临川王君墓志铭》）屡赴进士试不中，一生颇为失意，年三十七而卒。

(三)

王安石夫人吴氏，是外祖父吴旼之兄吴敏之孙女。吴家世居抚州金谿，敏以淳化三年（992）成进士，为吴氏以儒起家的第一人。吴氏“亦能文，尝有小词《约诸亲游西池》句云：‘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皆脱洒可喜”（魏泰《临汉隐居诗话》）。

王安石兄弟七人。兄长安仁、安道为徐氏所出，弟安国、安世、安礼、安上和安石自己，皆为吴氏所生。

长兄安仁，字常甫，“七岁好学，毅然不苟戏笑，读书二十年”，“学完行高，江、淮间州争欲以为师”，又“孝友最隆”（《亡兄王常甫墓志铭》）。皇祐元年（1049）进士，任宣州（今属安徽）司户等职。享年三十七岁。有文十五卷。

次兄安道，字勤甫，亦早逝。

大弟安国，字平甫，自幼聪颖，未曾受学，而文词天成。十二岁时出示所作铭、诗、赋、论数十篇，词语警拔，士大夫交口赞誉，遂以文章称于世。“于书无所不该，于词无所不工”（《平甫墓志》）。然数举进士不中，熙宁元年（1068），韩绛等举荐其材行，赐进士及第。曾任西京国子监教授、崇文院校书、著作佐郎、秘阁校理等职。后与安石政见不一，对新法多有非议，尤对吕惠卿不满。及安石罢相，吕惠卿主政，遂被夺官，放归田里。既而复官，命下而已卒，享年四十七岁。著作有《王校理集》。他诗文兼胜，“其文闲富典重，其诗博而深”，“其于诗尤自喜，其忧喜哀乐感激怨怼之情，一于诗见之，故诗尤多”（曾巩《王平甫文集序》）。所作诗典雅清丽，颇具特色。如《题滕王阁》：

滕王平昔好追游，高阁依然枕碧流。胜地几经兴废